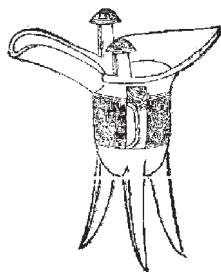


公主的銅器

元代全寧路祭器小考

陸鵬亮



若論元代文物，以書畫陶瓷為大宗，為世所重。然而當時的銅器或因斷代困難，或被視為仿古之物乏善可陳，尚未引起充分重視。元代銅器所蘊含的文化、藝術價值實則頗有可觀，隨著各地陸續出土及館藏銅器的公布，其面貌亦漸趨明晰。內蒙古出土有兩件銅器，據其自銘可知正是元大長公主祥哥剌吉為其封地全寧路三皇廟和文廟捐資定鑄的祭器，頗可管窺當時銅器鑄造風貌，亦見蒙元貴族之重儒宣文。適逢本次國立故宮博物院舉辦特展「公主的雅集——蒙元皇室與書畫鑑藏文化特展」，希藉此小文探考這位蒙元公主熱心文化多元面向之一端。

一九五七年秋，內蒙古赤峰猴頭溝出土一件銅器，器身鑄有銘文「皇姊大長公主施財鑄造祭器永充全寧路三皇廟內用」。(圖一)(註一)無獨有偶，赤峰轄區內的翁牛特旗近年也發現了一件銅爵，鑄有類似銘文，但係供同城文廟內用。(圖

二)(註二)學者據其銘文考證此二器當為元代魯國大長公主祥哥剌吉(約一二八三—一三三一)為其封地全寧路捐資所鑄銅祭器，且聯繫《元史·仁宗本紀》中有關公主曾於延祐六年(一三一九)因作佛事釋放全寧路囚犯事，以為旁證。(註三)這位

公主身世顯赫，是元世祖忽必烈曾孫女，武宗之妹，仁宗之姊，文宗是她的侄兒，也是她的女婿。武宗在大德十一年(一三〇七)繼位封其為「魯國大長公主」，為「皇妹」。至大四年(一三一三)仁宗繼位後即進號為「皇姊大長公主」，及文宗繼位之天



圖1 元 全寧路三皇廟銅簋 高9.1，寬31.4公分 內蒙古博物院藏 引自《內蒙古珍寶：內蒙古自治區精品文物圖鑑（青銅器卷）》



圖2 元 全寧路文廟銅爵 高21.4，寬21.7公分 赤峰市翁牛特旗博物館藏 引自《內蒙古珍寶：內蒙古自治區精品文物圖鑑（青銅器卷）》



圖6 《考古圖》卷1 「王子吳鼎」 局部 明泊如齋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5 三皇廟銅簋與《至大重修宣和博古圖錄》卷17「周師望敦」局部對比 「周師望敦」引自國立故宮博物院藏《至大重修宣和博古圖錄》，元至大間刊明印本。



鑄於何時

首先，是否有可能確知這兩件銅器鑄於何時呢？

二〇〇五年，在翁牛特旗烏丹鎮（即全寧路故址所在地）住宅施工時出土了斷碑一通，為此提供了背景線索。（註五）該碑通高三一一分，碑額篆書陰刻「全寧路新建儒學記」，立碑於泰定二年（一三二五），碑文正書，有關此儒學建置，可見大概：該儒學為皇姑魯國大長公主囊加真

曆元年（一三二八）更尊為「皇姑大長公主」。其最為後人稱頌的便是其書畫收藏，雅集文士，翰墨題贊，堪稱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女性書畫收藏家。（註四）然而這位公主贊助地方禮學之舉則尚少有論述，這兩件銅祭器為我們提供了極好的實物佐證。其銘文惜無直接紀年，正史文獻中也沒有更多詳細記載，其鑄造施用的具體情況尚付闕如，且此二器為目前僅見和蒙元皇室有直接關聯的銅祭器，頗值探究，故就近日檢視所得資料，作一初步分析。

（世祖忽必烈之女）同駙馬濟寧王蠻子台於大德初年創立全寧城時所建，近三十年後，皇姊大長公主祥哥剌吉再建儒學，立此碑。碑文多有漫漶，新建儒學的詳細未明，但可以肯定的是皇姊魯國大長公主曾在泰定年間經略全寧路文廟，而上述這件銅爵，當有很大可能是這位公主在泰定初年施財所鑄。

有關公主的另一件三皇廟銅器，則有元代文學家柳貫（一二七〇～一三四二）的一篇代人所作的《全寧路新建三皇廟記》，可窺端倪。所謂「三皇廟」為祭祀上古三皇伏羲、神農、黃帝之所，為元代創制，都城至地方均有設置，保佑生民福祉，以醫官管理祭祀之事。據《元史·祭祀志》載，自元貞元年（一二九五）始命郡縣通祀三皇，如宣聖釋奠禮，以醫師主之。柳貫此文就全寧路建廟交代清晰，贅錄於此：「徧天下郡邑成立廟建學，有師有生，而全寧路獨闕。全寧為駙馬都尉魯王分邑，延祐四年，魯國大長公主以帝姊居藩首，捐湯沐之資，作新廟於大永慶寺之東。陛楯

豐崇，像圖煥儼。春秋薦事，牲碩酒清。禮典斯應，神亦寧止於是。」（《柳待制文集》，卷十四。）由此可見，這件銅祭器正是當日用於全寧路三皇廟「春秋薦事」之器，其鑄造年代當不會早於延祐四年（一三二七），即全寧路三皇廟落成之時。

結合這兩條文獻材料，或可對這兩件銅器的鑄造年代排列出以下三種可能：

1. 延祐四年，公主施財新建三皇廟時即為之定鑄銅祭器，並為當時由上一代皇姑大長公主時建造的儒學文廟也定鑄了銅器。
 2. 延祐四年，公主建三皇廟時曾為之定鑄銅祭器；此後泰定二年新建儒學文廟時，又定鑄了一批銅祭器。
 3. 延祐四年建三皇廟時尚未定鑄銅器，待八年之後的泰定二年新建儒學之際，才一併為兩處定鑄了銅器。因天曆元年（一三二八），公主已進號為「皇姑」，不會再如銅器銘文中稱「皇姊」，此年當為下限。
- 從兩器風格來看，其銘文字體行格如出一轍，紋樣風格近似，更有



圖4 《紹興州縣釋奠儀圖》禮器圖式 簋 引自清乾隆間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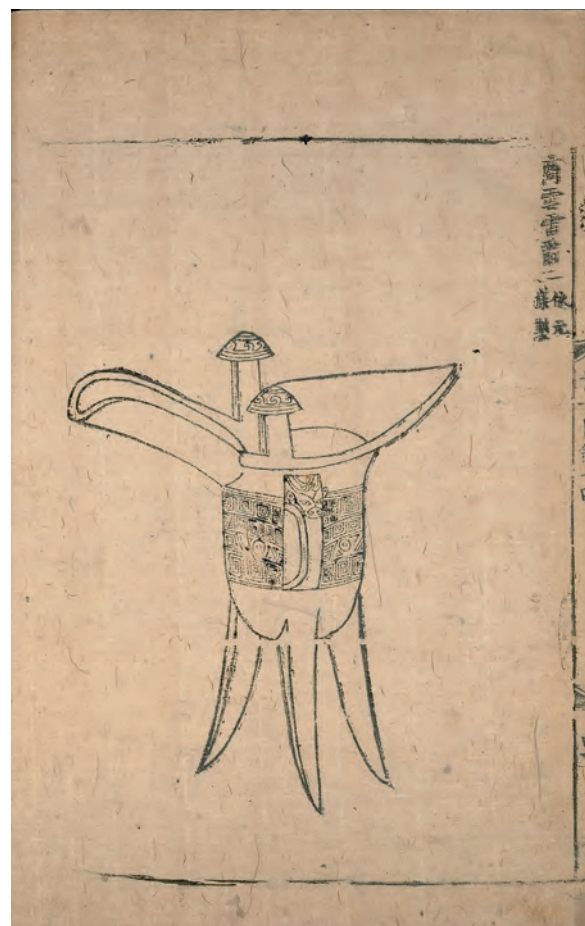


圖3 《至大重修宣和博古圖錄》卷14 商雲雷爵 元至大間刊明印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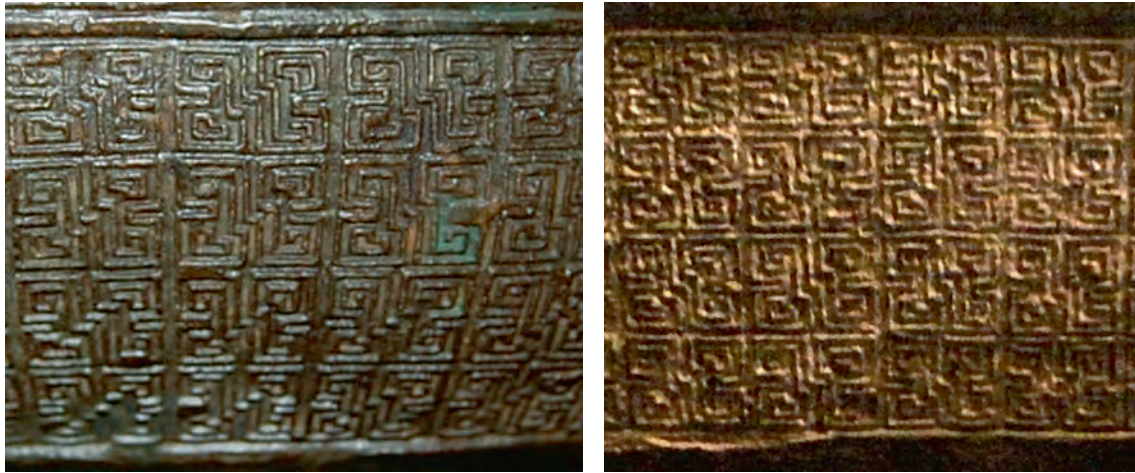


圖8 三皇廟銅簋（左）與鎮江路銅簋（右）細部雷紋比較

這件三皇廟祭器的紋樣風格及細部處理十分近似，正可茲比較。上博這件銅器為一簋蓋，器內有銘文：「延祐元年，歲在甲寅，提調學校官鎮江路總管段庭珪、儒學教諭郭景星謹識」。（圖七）由此銘文知此器為鎮江路學祭器。觀察其器身的細密雷紋，正與三皇廟器施用者相合。（圖八）其每個單位的雷紋為四個方形組合，一般常見的雷紋地，都是單個方塊回形組合，而這種四聯方雷紋十分少見。這兩器在此紋樣的處理手法幾近一致，或正暗示兩者之間的某種關聯。同時，鎮江路器上方的波曲紋處理也是以單線凸起表現紋樣，三皇廟器上的勾曲雲紋雖然紋樣不同，但表現手法還是十分相似，而且與細密雷紋疏密並置的手法也是如出一轍。最大的風格不同在於其銘文處理。鎮江路器以篆書鑄於蓋內隱蔽之處，而三皇廟器則鑄於器表，楷書直陳，頗為炫耀，或和公主定鑄的特殊身分有關！當然，兩器一為蓋、一為身，其落款位置本或有所區別。從具體的鑄造年代上，鎮江路鑄於延祐元年（一二二四），較三

皇廟器略早，但亦相去不遠，因而很有可能同鑄於一地。

有關鎮江路學祭器，在當地方志中有所記載，宋淳熙年間製作的竹木祭器五百餘件，在元代「皆易以銅」，其董事之人正包括了上博所藏器蓋內銘文出現的郭景星。（《至順鎮江志》卷四，「銅器」；卷十一，「祭器」條。）此蓋應當正是志書所載的這批銅器之一。其具體在何處鑄造方志中並未提及，而書中涉及鎮江當地特產銅器一條稱唐代有貢器，但「今無之」，可見這批銅器應非本地鑄造。十分湊巧，距鎮江僅四十公里的句容正是宋元文獻中具載的鑄銅重鎮。明初曹昭稱「唐天寶間至南唐後主時，於句容縣置官場以鑄之」為「局器」。（《格古要論》卷上，「局器」條。）宋人詩文中也多有提及句容銅器，如楊萬里曾作詩答謝友人所贈「句容香鬲」，所謂「句容銅山搗金屑，幻出羽淵三足鼈。兩耳踰肩一腹蟠，解吐黃雲香刮骨。」（《誠齋集》卷十，「謝丁端叔直閣惠永嘉縣研句容香鬲」。）元人丘衍稱「宋南渡後，古銅絕無，士大



圖7 元 鎮江路學銅簋蓋 上海博物館藏

可能同鑄於一時一地。上述儒學記碑文中並未提及皇姊大長公主此前為文廟定置祭器或其他資助之舉，故更可能是在泰定二年新建儒學前後一併鑄造。因而筆者更傾向於上述第三種推斷，即一三二五年左右鑄成。當然在沒有更確鑿的實物或文字資料發現前，大致斷代於一三二七至一三二七這十餘年間，當不大謬。

鑄於何地

通過上述文獻已可大致得知這兩件銅器的鑄造年代，但是否有可能知道究竟在何地鑄造的呢？即在全寧路當地冶鑄，還是另向別處定鑄？

宋元以後銅器鑄造地的確定也是目前比較棘手的問題。不同於陶瓷，尚可依據窯址出土標本比對確定，宋元銅器作坊遺址幾無發現。如果沒有明確的銘文或文獻材料，那就僅能從其器物本身的風格樣式來推斷了。這兩件祭器為較典型的仿古制式。文廟用爵，雙柱、單板、三足，器身一周雲雷地獸面紋，應以當時興盛的木刻金石圖錄《考古圖》、《宣和博古

圖》為本。（圖三）（註八）其紋樣形制都較為常見，頗難顯示地域特徵。三皇廟器則為橢圓形器身，雙獸耳，器身上下施勾曲雲紋及雷紋兩道。就其形制而言，以周代銅盥為範，惜已失蓋及足。而此類器在宋元時期均被定名為簋，而成為禮器的一個重要品類，在金石圖錄及禮器圖式中均有所見。（圖四）這件銅器的紋樣細部處理或許可以給我們提供一些其具體鑄造地點的線索。

此器器身上層勾曲雲紋與《宣和博古圖》中的「周師望敦」中所見十分相似（圖五）；而下層的雷紋則同《考古圖》中所見一鼎的紋樣近似。（圖六）這種將木刻圖錄中出現的不同器物所見紋樣混用正是宋元時期銅器的一個重要特徵，並非完全模仿圖錄中所見的某件器物，而是往往糅合各種器物的形制和紋樣，而為其設計增添多種組合可能。在這一巨大的設計方向內，其細部處理則會因人因地的不同而呈現差異，從而有助於分析各地的風格特徵。

上海博物館館藏有一件銅器，和

以上對這兩件大長公主為全寧路定鑄銅器的分析，大致推斷出了一個時空框架。但更精確的結論還有待更多的新資料發現。作為目前僅見的兩件蒙元皇室定鑄銅器，也可以此出發，為更多並不限定于祭器的元代銅器提供重要的紋樣風格斷代標準。當然希望見諸文獻的大都太廟、和林文廟等處的皇家祭器在日後有更多發現，才能對元代銅器有更全面的認識。

同時，從這兩件銅器也不難看

餘論

冶鑄一重地，但從行政區劃而言，吉安屬江西行省，而非江浙行省，應不是為皇家冶鑄之地。但從這些文獻中可見，元代無論皇室或地方官吏在冶鑄銅器方面往往選擇江南地區，因祭器作為禮制之重要表徵，均以質量上乘為第一要求，因而不辭路途之遠，即使遠在邊陲的雲南也會向江南地區定制，那麼作為大長公主封地的全寧路祭器，完全有可能向江南冶鑄中心定制，從其紋樣風格而言，很有可能正是當時的冶鑄重鎮句容所制。

夫所用唯句容新物。」（《聞居錄》，「三代古銅」條。）句容本地方志中載其特產「金之品」中亦有銅器「出句容境內，今文廟有唐宋古祭器」，縣治東北四十里的鳳壇鄉有銅冶村。（《弘治句容縣志》卷一，「鳳壇鄉」；卷三，「金之品」條。）現見有後至元六年所立《句容縣學大樂禮器碑》中也載有當時為文廟鑄造祭器。（註七）由此來看，鎮江路學的這批祭器極有可能正是宋元鑄銅重鎮句容的產品。

以上述三皇廟器同鎮江路學器

兩相比較來看，其紋樣風格統一，很有可能均是在句容所鑄。但鎮江與句容相去甚近，而遠在塞外的全寧路是否可能向江南定鑄呢？這一作法其實在元代並不罕見，而且更反映了蒙元皇室定鑄祭器的動向。據《元史》記載來看，元代主要的銅器生產地在南方。元代皇室所用祭器，多從江浙定造。大都太廟於至元十四年（一二七七）落成，及英宗至治（一二三二）——一二三三）初年命江浙行省造新祭器。（註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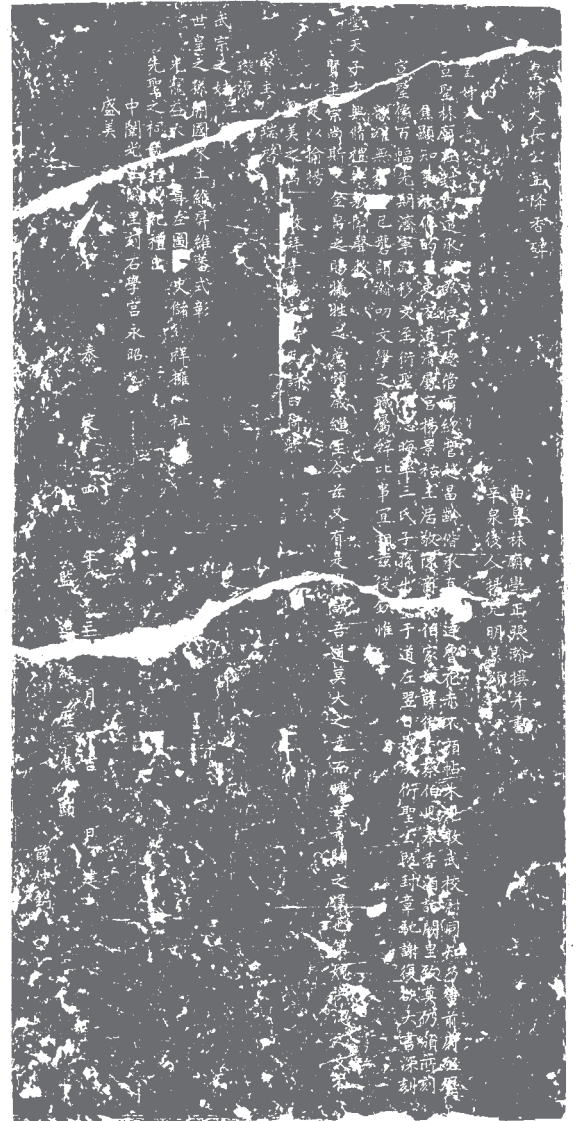


圖9 皇姊大長公主孔廟降香碑 拓本 引自《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第49冊，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頁116。

位于漠北蒙古的舊都和寧也建有宣聖廟，並在元寧宗即位之初的至順三年（一三三二），也是命江浙行省範銅造祭器。而到了至正九年（一三四九），在討論京師三皇廟祭祀規程的動議中，則有工部範鑄祭器，而雅樂器仍由江浙行省製。同時，各級官吏也多有向鑄造精良的江南地區定鑄祭器，不乏遠自千里之外者。位于曲阜孔廟在元初曾經歷過「祭器未備」的情況，曾於至元三十一年（一二九四）在江浙一帶購買舊器，並範鑄新銅器為用。（註九）泰定三年（一二三六），中慶路（今雲南昆明）儒學為鑄禮器，即「議以江西治鑄良合古制……江西以吉安為尤良……還良工考古制，為簋簠登銅爵尊勺凡百六十有八。」（劉岳申，《申齋集》卷六，「雲南中慶路儒學新制禮器記」。）同時，泰定四年（一二三二），廬陵曹君明為遠在河北涿州的孔子廟置祭器，亦「馳數千里還廬陵，範銅以易之。」（揭傒斯，《文安集》卷十，「涿州孔子廟禮器記」。）廬陵即吉安，可見此地亦是元代銅器



圖10 元 淮安路學銅爵 其銘文所見監郡忽里台、太守洪柱海弥當係蒙古或色目人 上海博物館藏

104.3.31-
106.2.26

陳列室 Gallery
303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11143台北市士林區至善路二段221號 | Tel: +886-2-2881-2021
No. 221, Sec. 2, Zhishan Rd., Shilin Dist., Taipei City 11143, Taiwan (R.O.C.)



皇帝的鏡子

清宮鏡鑑文化與典藏
REFLECTIONS OF
THE EMPEROR:
The Collection and Culture
of Mirrors at the Qing Court

註釋

1. 該器現藏內蒙古博物院，其最初發表文獻未述具體發現經過，參見內蒙古自治區文物工作隊編，《內蒙古出土文物選集》，北京：文物出版社，一九六三，頁九，圖一五九。
2. 該器為翁牛特旗博物館自民間徵集，參見高延慶主編，《內蒙古珍寶：內蒙古自治區精品文物圖鑑（青銅器卷）》，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七，頁一七〇。
3. 全寧路設於大德元年（一二九七），明初改為衛，故當係元代所制，而元時稱「皇姊大長公主」者有一：祥哥剌吉及壽寧。全寧為前者封地，且有延祐佛事釋囚之事，故得推知，參見前引《內蒙古出土文物選集》。此兩器也曾於二〇一〇年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舉辦之《忽必烈的時代》展出，展覽圖錄中亦有此論，參見James C. Y. Watt ed. *The World of Kubilai Khan: Chinese Art in the Yuan Dynasty*, New York: New Haven and London: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and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18-19.

4. 有關公主的收藏，詳見傅申，《元代皇室書畫收藏史略》，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一九八一，頁一一—一三三。
5. 此碑在一九三〇年代曾有日人鳥居龍藏、田村實造考察記載存於烏丹鎮關帝廟內，羅振玉在《滿洲金石志》中亦有記載，但此後便雪泥鴻爪，不見蹤跡，直至二〇〇五年十月才在當地建築施工中重新出土，並入藏翁牛特旗博物館，實為文物之幸。詳細情況參見李俊義、龐昊、孫再宜，《元代全寧路新建儒學記考釋》，《北方文物》二〇〇八年第一期，頁七五—八二。
6. 有關宋元金石學發展及禮器樣式的演進，參閱陳芳妹，《宋古器物學的興起與宋仿古銅器》，《美術史研究》第十期，二〇〇一；許雅惠，《〈宣和博古圖〉的間接流傳——以元代賽因赤忽墓出土的陶器與《紹熙州縣釋奠儀圖》為例》，《美術史研究》第十四期，二〇〇三。
7. 碑文中有載「命銅工為治造鑄鑄凡百伍拾有壹」，此本拓片見《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第四十九冊，鄭州：

8. 中州古籍出版社，一九九〇，頁二〇〇。
9. 此處文獻中雖未明確所造祭器為銅器，其所列祭器中除一些金銀器外，大部分未標明材質，當為銅器的可能性最大。
10. 此段故實見於現存孔廟的《至元三十一年闕里祭器碑》、《山左金石志》卷二十二有載，全文見駱承烈編，《石頭上的儒家文獻》，齊魯書社，二〇〇一，頁二六—二八。
11. 相關共有三碑，為《皇姊大長公主懿旨碑》（至大元年九月立）、《皇姊大長公主壽王祭孔廟碑》（至大元年十二月立）、《皇姊大長公主孔廟降香碑》（泰定四年三月立），見載於《山左金石志》卷二十二，全文見《石頭上的儒家文獻》，頁二五—二七、二七〇—二七一。

出大長公主對禮制文化的重視。除卻對全寧路的大力支持，她也曾數次為曲阜孔廟派員祭祀、降香。目前在孔廟碑亭尚存有當時所立石碑，可茲佐證。（註十）這些祭器也折射出當時整個時代尊崇儒學的大背景，蒙元貴族以儒學為其統御之利器，加封孔子「大成至聖文宣王」，恢復科舉，各地州縣廟學大興，地方官吏極注重修

廟鑄器。值得注意的是，傳世相當數量的元代祭器上出現了詳細的銘文，備述其主事之人員、時間、地點，不少祭器銘文中所載的人物並非漢人姓氏，連蒙古、色目官員均在儒學祭器上留名，世風可見一斑。（圖十）這樣的銘文較上述兩件公主施財之器，似已有角色的轉換，成為了當時各級官員重要的「政績」所在。這一銘文

形式的發展，主要見於元代中後期，有宋一代祭器中似尚未見有錄地方官員者，而明清兩代則廣見因襲，成為範式，實為元代銅祭器之影響深遠的創制。大量傳世元代祭器銘款中蘊藏的豐富信息，也是補史闕疑的重要材料，有待未來的進一步發掘！[■]

作者為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專刊·基辛格研究學者